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0.02.022

胡裕树继承、发扬陈望道修辞学思想的 出色贡献

宗廷虎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摘要:胡裕树继承、发扬陈望道修辞思想历时数十年。最主要的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身体力行地对陈望道修辞思想进行阐发和发展;二是充分发挥复旦大学修辞学基地的作用。他留下的宝贵历史经验,是中国修辞学一宗珍贵的财富,值得永远铭记。

关键词:胡裕树;陈望道修辞学思想;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0)02-0148-08

胡裕树先生作为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他在语法学领域的杰出贡献,早已载入史册,闻名遐迩。但迄今为止,他对我国修辞学研究的杰出贡献,还鲜有人系统总结。本文拟对他继承、发扬陈望道修辞学思想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作较为系统的探索。拟从两个方面总结裕树先生继承、发扬陈望道修辞思想的历史功绩:对陈望道修辞学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阐发和发展;充分发挥复旦大学修辞学研究基地的作用。

一 对陈望道修辞理论和实践研究的 阐发和发展

裕树先生对陈望道修辞理论的阐发和发展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探讨其中较为突出的三点。

(一)《词汇、语法、修辞》对修辞学对象、特征研究的发展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被认为是我国现代修辞学史上的里程碑,但由于历史原因,这部1932年问世的专著,没有来得及对修辞学的对象、特征等问题,从理论上做出直接回答,这一任务由胡裕树、张斌、林祥楣合著的《词汇、语法、修辞》(笔名林裕文,上海新知识出版社

1957年出版)首先进行了出色的探索。该书认为“修辞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科”,与词汇、语法、语音等语言学分科有着不同之处,“修辞学……不只研究语言的某一个组成部分,某一个方面,它的对象包括语言的所有组成部分。修辞学要研究用词,必然要涉及词汇;修辞要研究各种不同的结构,不同类型的句子的表达效果,语法构造就不能不管;某些修辞现象是借助于语音来表现的,不能不从语音上加以说明,所以语音也要研究。这样看来修辞学显然是一种综合性研究。不但如此,它还要研究成段成篇的话,这就是说,篇章结构也是修辞学研究的对象。”该书还阐明了“修辞和逻辑、语法的关系”,同时明确指出:“风格和语体”“的确是修辞学的重要内容之一”^①。此书问世时,正值新中国建立不久,修辞知识普及的任务十分繁重,理论研究不但非常薄弱,还很少受到关注。裕树先生等在研究《发凡》的基础上,对上述课题做出了有创意的回答,可说难能可贵。正因为如此,高万云评价说:《词汇、语法、修辞》对“修辞学是一种综合研究的语言学科”的论述,“是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之后最有理论深度的表述”^②。

收稿日期:2019-08-18

作者简介:宗廷虎(1933—),男,江苏扬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修辞学研究。

①林裕文:《词汇、语法、修辞》,上教育出版社1959年新1版,第72-77页、89-91页。

②宗廷虎主编,高万云著:《中国修辞学(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66页。

这在当时起到了表率作用,也是对陈望道有关修辞学对象、特征研究的继承和发展。

(二)对陈望道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修辞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

望道先生1962年在复旦大学纪念《修辞学发凡》出版3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发凡》时,我曾努力想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指导……我的得益还是在这方面……如果说这本书还有一些可取的地方,则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指导的缘故。”^①20年后,裕树先生在中国修辞学会与复旦大学联合召开的“纪念《发凡》出版50周年学术座谈会”的发言中,率先对此书上述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作了精辟的总结,“三十年代的学术界还不大懂得用马克思观点来指导学术研究,修辞学也是这样。一部分学者的观点、方法,基本上是来自西方和日本的,以外为主,据外论中;一部分学者的观点、方法,基本上又是沿用古人的以古为主,据古论今。望道先生则力求把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应用于修辞学研究……望道先生在回忆《发凡》的时候说:‘《发凡》与别的书的不同之处,一是有理论,一是比较全面。’这儿的理论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儿的全面,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比较全面。”并且深刻地指出:“望道先生是我国修辞学界第一个全面系统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②由于该文是代表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在会上的主题发言,后又收入第一本为纪念《发凡》而编的论文集,与会者有众多中国语言学界、修辞学界的著名学者,文章内容所起的导向性作用非常明显。

与此同时,裕树先生于1982年和1983年连撰两文,对上述观点作了更进一步的具体阐发。如在《用辩证法指导修辞学研究——陈望道与〈修辞学发凡〉》中指出“这本书为什么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最重要的原因是作者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来指导修辞学研究”。论文首先盛赞《发凡》“从内容和形式对立统一的角度去全面论述修辞方式,这在当时是罕见的。”“《发凡》既以大量篇幅谈了修辞技巧,又首先强调了它与思想内容的关系,突出了修辞的目的。”因为当时修

辞学界存在两种认识上的偏颇:一种观点认为“修辞学必须研究文章的思想内容,把主题和题材的选择都纳入修辞的范围,于是修辞学成了作文法;一种看法认为谈修辞要撇开思想内容不管,孤立地谈修辞技巧”。望道先生“后来在回忆中指出:‘我因为学过马列主义,就用内容决定形式的观点来向形式主义进攻。’……他甚至主张‘研究修辞应以内容决定形式作为研究的纲领’”。“作者明确指出:‘题旨和情境的洞达’以及‘语言文字可能性的通晓’乃是‘修辞技巧的来源’。前者占第一位,后者占第二位,主次关系不容颠倒……总之,作者从内容和形式对立统一的角度去全面论述修辞方式,这在当时是罕见的。”该文还从方法论的角度,用大量事实证明《发凡》是怎样做到“归纳法与演绎法相统一”的^③。又如在《修辞研究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作指导——学习〈修辞学发凡〉札记》中指出:“《发凡》一问世就被公认为在我国第一个建立了比较全面而科学的修辞学体系,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作者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作指导……望道先生早在1920年就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这是我国第一个全译本……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素有研究,造诣很深,他把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引入修辞学领域,这在我国还属首创。”

首先,该文论述了《发凡》贯穿了“全面的观点”。具体表现在:“第一,既研究修辞理论,又研究修辞规律。”“讲修辞,不讲或很少讲理论,这是一些修辞论者常犯的毛病……《发凡》的修辞理论分布的面很广,不仅在第一篇《引言》和第十二篇《结语》中,还在其余各篇分别阐述了消极修辞、积极修辞、文体或辞体理论。在具体辞格的‘备览’、‘附记’中,往往又引用了众多的古代学者精辟的修辞理论。总之,‘研究修辞一定要有理论’这是望道先生的切身体会。”“第二,既重视积极修辞的研究,也重视消极修辞的研究。”“第三,既重视总结文言文修辞规律,又重视总结白话文修辞规律。”“第四,既重视书面语修辞,又重视口语修辞。”因为“口语是‘源’,书面语是‘流’”,

^①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陈望道修辞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76-277页。

^②胡裕树:《〈学习修辞学发凡〉,为促进修辞学的繁荣贡献力量》,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③以上引文均见胡裕树、宗廷虎《用辩证法指导修辞学研究》,中国修辞学会首届年会论文,刊《复旦学报》1982年第3期。

而“文辞上流行的修辞方式,又常常是受口头语辞上流行的修辞方式的影响的”。

其次,该文还较为独到地从“规律”的角度阐发《发凡》运用事物与事物相联系的观点。指出:“望道先生研究文法、修辞,一贯讲究探索法则或规律。他对规律的解释是:‘所谓规律,就是事物的内在联系,就是客观的必然的关系’……《发凡》既从修辞现象的内在关系中去寻求规律,也从修辞现象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与邻近事物的关系中去寻求规律。这就比……孤立地就修辞研究修辞高出一筹。这也是《发凡》科学性强的一个重要原因。”接着重点论述三个方面。“第一,从语辞形成的整体中研究修辞。《发凡》在《引言》中专列一节来论述‘修辞和语辞形成的三个阶段’,把修辞放在语辞形成的整体中进行考察,这在当时的修辞学研究中,可说别具一格。”“第二,从与题旨情境的关系中研究修辞。《发凡》也专列一节来论述‘修辞’和题旨情境的关系。指出‘修辞必须适合的是题旨和情境’‘题旨和情境可说是修辞的标准,依据。’……认为,所谓修辞,就是对题旨,对应情境的语文应用……《发凡》还进一步提出了‘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的观点,把它作为衡量修辞好坏的准绳,提到极为重要的高度来认识。”“第三,在研究修辞的同时,也要研究相邻学科。修辞学的性质十分特殊,它与相邻学科的关系十分密切,是一门边缘科学,必须吸收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来丰富自己。望道先生有一次谈到他自己的研究经验:‘我搞了十几年马列主义、逻辑学、心理学、美学,才写出《发凡》来’。在别的场合他还说,研究修辞必须研究文艺理论、文章学和语言学的其他分支,如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等等。实际上,他自己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做的。”接着从六个方面“逐项论述”了修辞学与邻近学科的关系:(1)修辞学和哲学、逻辑学;(2)修辞学和美学;(3)修辞学和心理学;(4)修辞学和文艺批评;(5)修辞学和文章学;(6)修辞学和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该文是我国最早对望道先生的“边缘学科”论进行深入论析的,功不可没。

再次,该文还颇为难能可贵地评析了望道先

生“发展变化的观点”。文章要大家注意“望道先生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变化的观点也应用到修辞研究上,这就在修辞现象的分析上有不少独到之处。这在第二篇第九节《汉语文变迁发展的大势》和第十篇《修辞现象的变化统一》中,有集中的反映,在其他篇章中也有一定体现,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汉语文变迁发展的大势上看……第二,从修辞现象的变化发展中看……第三,从古往今来人们对修辞现象的总结、修辞现象的阐发上看。”文章强调:“望道先生指出,几千年来,汉语文一直在蓬勃发展着……修辞现象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正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上落,生灭。”“修辞研究应从变化发展的角度加以分析”。这就启示人们:修辞现象发展史,即修辞史的研究大有可为。同时强调“《发凡》全书就引了一百多位古人的170多段精辟的修辞理论,要大家认真学习”。这也为后人开辟修辞学史研究的领域做出了榜样。文章盛赞《发凡·结语》中为不少人熟知的名言:“从发展的眼光看,修辞学即使‘切实到了极点,美备到了极点’,也不过是作为‘后来居上者的参考’,‘要超越它所述说,并没有什么不可能,只要能够提出新例证,指出新条理,能够开拓新境界。’他殷切期望后来者迅速超过他,也相信后来者一定超过他。这种识见和气概,只有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下才能产生。”^①以上是一组率先阐发望道先生用马克思主义观研究修辞、揭示修辞内在规律的文章,不但会令人耳目一新、说服力强,还对今后修辞学研究起了示范作用,影响颇大。

(三) 强调向《修辞学发凡》学习创新精神

裕树先生在纪念《发凡》五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学习〈修辞学发凡〉,为促进修辞学的繁荣贡献力量》,文中论及“修辞学怎样才能更快地前进”这一问题时,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创新”。“立足于创新才能迅速改变修辞学的面貌。当年望道先生正是不满足于因袭前人成说,决心闯出一条新路,才给修辞学界带来焕然一新的景象的。今天,修辞学界要打破长期沉寂,停滞不前的局面。也必须有一批敢于冲破陈规的闯将。鲁迅曾经指出:作品‘以独创为贵’,‘依傍和

^①以上引文均见胡裕树、宗廷虎《修辞研究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作指导——学习〈修辞学发凡〉札记》,刊《修辞学研究》第二辑,中国修辞学会华东分会编,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如果满足于踩着前人的脚印走,以模仿《发凡》等著作为能事,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是‘最没有出息’的表现,科学也就不可能发展。”文章强调要响应望道先生的号召,要“立大志,找难度大的问题上。开辟新路的关键是有无决心攻坚,是有没有革命胆略”。怎样创新?他说:“创新,一定要建立在对前人遗产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正如望道先生所说:‘不是从别人的出发点起步,而是从别人的到达点起步,这样才能越跑越远。’”

裕树先生关于修辞学研究要创新的号召,首先在复旦大学语言研究所的成员中起了作用,研究所成员在几年的拼搏中捧出了几本论著,下文还要提到。他本人在由他主编的于1981年出版的全国高等学校统编教材《现代汉语》中,增添了修辞部分(袁晖执笔)。该教材被全国多所高校采用,影响很大。经多次修订,总印数达150多万册。曾荣获上海市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该教材修辞部分的创新之处为:从易教易学的角度着眼,充分考虑语言的结构因素,由词语、句子、篇章,语体和风格构成修辞部分的总体系。作者的观点是:“从修辞学的总体来看,词语和句子是一个层次,篇章组织是一个层次,语体和风格又是一个层次。这三个层次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修辞学的完整的结构系统。”^①该书与一般修辞学教材不同的是,没有把“修辞格”专列一节,而是将其溶解到各有关部分中去,避免修辞格与词语锤炼,句子选择的交叉重复,有利于修辞教学适用性的加强。吴士文评论这种教学体系“打破了过去集中讲授辞格的局面,把辞格和其他修辞手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体例比较新颖,讲解比较灵活,实用意义也比较显著”^②。

总之,裕树先生历任陈望道创建的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副主任、主任,身体力行地努力继承、发扬陈望道的修辞学思想,所起的表率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他的卓越功勋应该载入史册。

二 充分发挥复旦大学修辞学基地的作用

望道先生1977年去世后,裕树先生1979年任语言研究室主任,即全面考虑如何充分发挥望道先生创建的这个修辞学基地的作用。他虽于1982年调任中文系主任,工作更忙,但仍一如既往地指导与关心语言研究室的科研,千方百计调动每位成员的积极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组织研究室人员集体攻关

1. 组织集体撰写《修辞新论》

望道先生逝世后,我本来与邓明以、李金苓商定,想先治修辞学史。裕树先生认为,还是应该先研究陈望道修辞学理论,在此基础上再治“史”。在他的指导下,修辞组四人宗廷虎、邓明以、李熙宗和李金苓决定先写《修辞新论》,经过七年拼搏,于1985年交稿。裕树先生亲自审阅,我记得稿纸上多处留下了他亲笔改动的痕迹。可惜当时没有复印条件,未留下复本。该书于1988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袁晖在《汉语修辞学史》中评论:“此书是他们(引者按:指四位作者)研究修辞多年厚积薄发的结晶,问世后,反响强烈。正如香港《大公报》1988年12月12日书评所指出的,此书最显著的特点是具有‘新’和‘论’的特色。”^③第一,“作者十分重视修辞理论的探讨,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的基础上,继承陈望道的修辞思想,而又有所发展和突破。例如作者把内容决定形式作为修辞研究的纲领……指出题旨比情境更为重要。”“如作者认为修辞学是属于语言学范畴的,实用性很强的多边性学科。”第二,“作者从唯物辩证的对立统一观点出发,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建立了二元统辖修辞的新模式……作者还从修辞现象的多层次性、依存转化、发展变化等方面,进一步发挥其对立统一的修辞观。这一部分论述得相当精彩。”第三,“语言风格一章写得相当细致而充实。”第四,“概括地介绍了汉语修辞学发展的历史,为学习和掌握古今汉语修辞学发展的脉络,提供了一个相当准确而又可靠的教材……该章论述简要,时有新

^①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使用说明》,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04页。

^②吴士文:《修辞格论析》,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55页。

^③袁晖,宗廷虎主编:《汉语修辞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458-460页。

见。”此书虽由宗廷虎总体设计和统稿,但裕树先生的指导、修改之功应当永远铭记!

2. 大力支持撰写修辞学史

望道先生生前多次提出,希望研究室人员攻治汉语修辞学史。在裕树先生大力支持下,我们撰写了四部不同视角、不同体例的修辞学史,于1989年至1998年出版,计有宗廷虎、李金苓著《汉语修辞学史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袁晖、宗廷虎主编《汉语修辞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郑子瑜、宗廷虎、陈光磊主编的《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宗廷虎的《中国现代修辞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前三本为通史性质,但体例不同,后一本为断代史。高万云对这几本书作了以下评价:“《汉语修辞学史纲》是中国大陆第一本系统的修辞学史著作,它的主要特点是:以陈望道修辞学思想为指导,以辩证方法和系统论方法为主要方法,以‘史论并重’为主要书写体例……这本著作既是修辞学史著,也是修辞学论著。由于该书影响较大,所以于1995年获得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汉语修辞学史》可说是采众家之长的著作……该书第一次把香港、台湾和澳门地区的修辞学研究引入修辞学通史中,这就保证了汉语修辞学史的完整性。”该书获得陈望道修辞学奖二等奖。“《中国修辞学通史》是我国第一部多卷本修辞学著作,也是迄今为止篇幅最长的修辞学专著……(它)有着贯通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历史跨度……把修辞学放在纵的历史和横的文化坐标系中进行考察,因而使研究极具系统性……该书获得国家级奖项——第12届国家图书奖”,陈望道修辞学奖二等奖。而《中国现代修辞学史》“是中国第一部断代修辞学史,第一部现代修辞学史,第一部真正的修辞‘学’史,因为只有20世纪才有真正的科学意识。该书有三大特点,一是史料翔实,爬梳精细,能从具有障蔽性的学术著作中挖掘出修辞学文献来……二是分期合理,评述得当,能从复杂的修辞学研究中理出科学条理来……三是覆盖较广,减

少缺漏,能从别人忽视的领域采撷修辞学研究成果”^①。裕树先生逝世后宗廷虎主编的《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上、下卷也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先后获全国和上海市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几十年来,复旦大学修辞学史研究者不断从多种角度研究中国古今修辞学史,完成了望道先生在这方面的遗愿,同时在全国成为修辞学史研究的领跑者,是和裕树先生多年来的鼓励、指导分不开的。他曾经先后为《中国现代修辞学史》《汉语修辞学史》写序,并称赞校内外5位作者,如指出宗廷虎、李金苓“立意创新,不因循守旧”具有“献身学术,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②等。

3. 积极推动语体风格研究

望道先生多次指出,语体风格是修辞学研究的薄弱环节,他来不及深入探讨,希望后辈能够实现他的愿望。裕树先生很重视这个领域,带领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

(1)主编《语体学丛书》。经过反复讨论,群策群力,组织校内外人员撰写《语体学丛书》(被列为“七五”国家教委博士点重点项目),并由裕树先生亲自写“序”,“决定对现代汉语各类语体的语言特点做系统的描写研究”,“涉及的语体有公文、科技、政治、文艺等基本类型以及它们的分支类型,如散文体、韵文体、戏剧体、法律语体、辩论语体、广告语体等”^③。同时指定作者和李熙宗任“丛书”副主编。校内外人员纷纷认领课题,个别同仁还认报了两个。作者还与云南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合同,限时交稿。遗憾的是几年以后,只有潘庆云的《法律语体探索》与作者主编的《辩论语体》^④交稿。裕树先生多次下令要作者催促,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如该丛书所列选题多为前人未曾系统探索过的,参考资料很少,难度很大;加之我们没有组织集体科研项目的经验等),拖延交稿多年,出版社只接受两本,中止了其他书的出版合同。为此我曾受到裕树先生多次批评。

(2)主持召开全国首届“语体学学术讨论会”,组织人员编写《语体论》论文集。该会由复

①宗廷虎主编,高万云著:《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624-627页。

②胡裕树为《汉语修辞学史》所写《序》,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

③胡裕树《语体学丛书》总序,见潘庆云《法律语体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④笔者因同时在撰写修辞学史,精力有限,对“辩论语体”的理论探讨较弱,交出的初稿理论性欠强。后改名为《辩论艺术》(撰写者还有王十禾、丁世洁),列入由作者主编的《语言艺术丛书》中,仍由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旦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与中国修辞学会华东分会合办,与会的有全国各地及港澳地区著名语言学家和在语体研究上有一定成绩的中青年语言工作者百余人。裕树先生与作者合写了《语体学与修辞学》一文,对语体学的对象、范围、性质、任务等理论问题作了探讨并展望了语体学能为修辞学研究开辟的广阔前景。《语体论》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影响较大。

(3)鼓励、培养进修教师李伯超撰写《中国风格学源流》。1996年,湖南青年学者李伯超到复旦大学当我的“访问学者”。他说想在进修一学期期间写一本《中国风格学源流》的初稿,这一想法正好符合望道先生要加强语体风格研究的遗愿。于是我经常与他切磋讨论,并请他参加我所指导的博士生的课堂讨论,要他看我们所写的古代修辞学史,其中夹杂了多个朝代的学者有关语体风格的片段论述。我向裕树先生汇报后,他非常高兴,并答应书成之后,为它题写书名。伯超经过一个学期的艰苦拼搏,写成了初稿,回去后又再三修改,终于成书。封面上就印上了望道先生的语录:“要建立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科学的风格学……我国古代关于风格的研究材料,是我们丰富的修辞学遗产当中一宗宝贵的财富。”由此可以看出,它与陈望道修辞学思想的渊源。该书1998年由岳麓书社出版。我在《序》言中赞扬此书是风格学领域的“开创之作!风格学终于有了一本‘史’”,并认为该书“体例与结构均有新意”“坚持史论结合的原则”“既注意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又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持论公允,言出有据”。袁晖在《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中认为:“《中国风格学源流》是一本全面论述风格学史的专著。”“把语言风格研究的历史,从唐宋到明清,理出一个初步的脉络。”但又认为“这本书毕竟不是一本专门论述语言风格研究史的专著”^①。可能是因为该书还用了较大篇幅论述了文学风格源流的缘故。但由于此前一无依傍,其开创之功不可没!现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伯超虽已是大学校长,但他青年时代在复旦为继承、

发扬陈望道修辞学思想而奋力拼搏的佳话,也已成为他一生中“一宗宝贵的财富”!

(二)多角度促使复旦大学修辞学基地多做贡献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复旦大学修辞学基地在裕树先生领导和关心下,以下举措曾产生很大影响。

1.主持、推动四次全国性大型修辞学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

(1)纪念《修辞学发凡》出版五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中国修辞学顾问胡裕树在开幕词中,率先论证指出: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是汉语修辞学的里程碑。中国修辞学会会长张志公在发言中也认为《发凡》“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要著作”。与会学者一致高度评价《发凡》,认为它“对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建立和发展起了奠基和开拓作用”^②。会后出版了《〈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2)全国首次语体学学术讨论会。用高万云的话说:会后“出版了高水平的论文集《语体论》”^③。(3)语法、修辞方法论学术研讨会。此会于1987年10月望道先生逝世十周年时举行,会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语法修辞方法论》。胡裕树在《序》中指出:“望道先生毕生研究语法修辞,他一贯重视方法、方法论的研究和探讨……在他逝世十周年之际,举行了学术讨论会,出版论文集是对他的最好纪念。”^④(4)纪念陈望道先生诞辰100周年大会,其间召开“陈望道学术思想研讨会”。会后出版了《陈望道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论文集》及《语法修辞论》。吴士文在《陈望道和中国修辞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中评论道:“陈望道先生培养了一大批修辞人才,使修辞事业后继多人……他亲手组建的语法修辞研究室的修辞小组如今已成为‘修辞大军的一支劲旅’……胡裕树、宗廷虎的宣传陈望道先生修辞学治学经验的文章不仅质高,在量上也没有出其右者,研究室在短短的八年中举行四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出版或即将出版的五本全国性的学术会议论文集,在国内同类研究室中位居‘室’首,这就使

^①袁晖:《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书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498-499页。

^②东木:《接过望道先生的接力棒》,载《〈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62-464页;《文汇报》《解放日报》均于会议次日在头版作了报导。

^③宗廷虎主编,高万云著:《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80页。

^④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语法修辞方法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复旦语法修辞研究室在全国修辞学界凝聚力更强,形象更高大,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如今人们已把修辞研究众多成果和复旦大学联系在一起了,和陈望道先生联系在一起了,和胡裕树、宗廷虎等人联系在一起了。”^①

2. 建立复旦大学语言学博士点,率先招收修辞学博士生

改革开放后,裕树先生申请的复旦大学语言学博士点获得批准,修辞学方向由宗廷虎在全国率先招收博士生。二十几年来,已有多名教授如李熙宗等陆续参与招收,所招修辞学博士生的批量、人数均居全国前列。在导师的指导下,已有多名博士生写出从多角度继承、发扬陈望道修辞学思想的论文,不少已形成专著出版,影响颇大。有的虽非博士论文,也是在复旦写成的专著。限于篇幅,仅以第一个博士吴礼权所著《中国修辞哲学史》为例。该书1995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袁晖在《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中评论:“《中国修辞哲学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我国古代修辞哲学史的著作”,“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是具有开拓性的”^②。高万云也评论:“还有一部具有填补空白性质的修辞学史著,就是吴礼权的《中国修辞哲学史》。该著……不但对中国修辞哲学的整体面貌作了批判……而且对具体的修辞哲学思辨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不仅能历时地考察各个时代的修辞哲学思想的发展演进,而且能揭示其中的原理规律,具有较高的科学品味和理论色彩。”^③

3. 支持全国唯一的修辞学杂志《修辞学习》,挂钩在复旦大学出版

《修辞学习》原由华东修辞学会编辑,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后因中央规定不能异地编辑、出版刊物,华东修辞学会建议挂钩在复旦。裕树先生亲自去找校领导汇报,最后争取到同意挂靠,改由华东修辞学会、复旦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共同编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修辞学习》杂志得以延续至今,裕树先生功莫大焉!他还一直担任该杂志的顾问。数十年来,该杂志宣传陈望道修辞学思想不遗余力,裕树先生去世后,更名为《当

代修辞学》,并加强理论探讨,目前依旧是全国独一无二修辞学杂志。

4. 面向全国,支持“陈望道修辞学奖”评选三届

我们通过复旦大学顾问教授郑子瑜先生,争取到海外企业捐款,设立了“陈望道修辞学奖基金”。裕树先生建议由复旦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王运熙先生任基金管理组组长,我任副组长,负责面向全国修辞学研究者,评选、发放“陈望道修辞学奖”共三届,全国众多学者申报,多人获奖,影响很大。

三 几点历史经验

裕树先生继承、发扬陈望道修辞思想为何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有几点历史经验可以借鉴。

(一) 抓准了陈望道修辞学思想最显著特征

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修辞学研究。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更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修辞的内在规律,这也是陈望道修辞学研究之所以能成功的奥秘所在。裕树先生不但不止一次地与我联合撰文深入探讨,还指导修辞组写成富有新意的专著《修辞新论》,问世后颇受好评,促使我们进一步探讨的信心大增,后劲更足。

(二) 抓住了当时修辞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攻关,并一抓到底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根据望道先生的遗愿,在裕树先生支持和指导下,从修辞理论、修辞学史、语体风格三个视角探究,步步深入,紧抓不放,终于取得了成效。裕树先生逝世后,我们又抓了与修辞学史相关的又一薄弱环节修辞史攻关,同样受到好评,可见抓薄弱环节抓对了。

(三) 善于调动多方面积极性,共同攻关

一是调动语言研究室成员的积极性,虚怀若谷地听取意见。由于裕树先生长期兼任副主任、系主任,还要主攻语法研究,修辞学方面就交给我负责。他除了经常检查、督促科研进度外,还鼓励我多提意见。并且在《汉语修辞学史》序言

^①吴士文:《陈望道和中国修辞事业的发展与繁荣》,载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语法修辞论——纪念陈望道先生诞辰100周年论文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②袁晖:《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书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608页。

^③宗廷虎主编,高万云著:《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30页。

中对我与李金苓评价道:“我和他们相处的时间最长,朝夕过从,切磋讨论,他们的学术见解,往往给我以启发。”他的肯定虽然令我汗颜,但从中可以看出他善于听取意见、虚怀若谷的人品。“序言”中“用力最勤,论著最多”,“在修辞学研究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①的肯定也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激励作用。与此同时,当我抓《语体学丛书》严重受挫,最终夭折时,他失望的眼神,严厉批评的言辞,几十年后还历历在目,言犹在耳,令我终生记取。他的领导艺术使我受益无穷,启示良多。二是联合有关组织,如中国修辞学会、华东修辞学会、上海语文学会等共同宣传陈望道修辞学思想,同时充分发挥语言学博士点、《修辞学习》杂志、“陈望道修辞学奖基金会”的作用,因此力度陡增,影响很大,而且历久弥新。三是组织、促进语

言学界重量级学者如吴文祺、倪海曙、张志公、张斌、郑子瑜、吴士文、倪宝元等先生撰写纪念望道先生的文章,使宣传质量有了大幅度提高,吸引力也大为提升。吴士文在《陈望道和中国修辞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中有以下论断:“中国修辞事业的发展与繁荣,陈望道先生逝世后的作用,远远超过他的生前。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陈望道先生就不会有修辞学的今天。”^②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望道先生逝世后,陈望道修辞学思想的影响,之所以大大超过他的生前,是和他的追随者的宣传、继承和发扬分不开的,其中,胡裕树先生应居头功!

值此裕树先生百岁诞辰之际,我们在深切缅怀他的同时,总结他的成功之道,对进一步继承、发扬陈望道修辞学思想,推动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和繁荣,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On Hu Yushu'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Chen Wangdao's Rhetoric Thought

ZONG Ting-h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Hu Yushu ha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Chen Wangdao's rhetorical thought for decades. His main contributions to it lies in the two following aspects. One is that he has earnestly elucidated and developed Chen Wangdao's rhetoric thought and his practice. The other is that he has given a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rhetoric base of Fudan University. The 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 left behind by him is a precious treasure of Chinese rhetoric, which is worth remembering forever.

Key words: Hu Yushu; Chen Wangdao's rhetoric thought; historical experience

(责任校对 朱春花)

^①袁晖,宗廷虎主编:《汉语修辞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②吴士文:《陈望道和中国修辞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语法修辞论——纪念陈望道先生诞辰100周年论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80页。